无处安放的精英：特罗大众化理论视角下中国精英高等教育的变迁与危机

潘帅 徐丹

（湖南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 长沙，410082）

摘要：从少数特权阶层的教育到博雅教育，再到师生关系亲密，激励学生远大抱负的教育，马丁·特罗对精英高等教育内涵的界定从学生来源到内容再到形式的变化过程，是精英教育从服务于阶层分化到个人发展再到社会责任的过程，也是精英高等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精英社会化的过程。而中国语境下的精英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府指令色彩，体现国家意志的原则，与马丁·特罗对精英高等教育内涵的理解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旨向。特罗理论启示我们：精英高等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为数有限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它有更丰富的存在形态；精英高等教育的内涵应当有更开阔的视野，从世俗的职业发展成就转向强调个体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责任，强调高等教育的"成人"作用。

关键词：精英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变迁；危机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A

高等教育的量与质，一直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2016 年教育部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42.7%。根据特罗的理论，我国已距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转轨进入普及化阶段不远矣。获准进入高等教育的参与人数的激增和国民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更高要求，让作为高等教育质量制高点的学校和人才广泛进入社会民众视野。如何在数量飞速发展的前提下，保证其质量也能够得到同步发展，一直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难题。基于此，笔者以特罗大众化理论为视域，对中国精英高等教育的变迁和危机进行一系列梳理，理清中国一直以来走的是哪种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未来又应该如何做，才能走向更高效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一、阶层特权、个人发展与社会福祉：精英高等教育的内涵变迁

精英高等教育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马丁·特罗认为，这一概念的内涵至少经历了三次变迁。"它曾经大量地被轻蔑地用来指那些为富裕而强大的家庭后代而办，却不对地位低，权利小，财富少，收入低的家庭开放的教育"[1]按生源出生定义的精英高等教育，教育权只掌握在少数富裕阶层手中，是强化社会阶层分化的工具。精英高等教育也曾经指"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中心的传统人文教育，包括古典哲学，历史和数学。传统人文教育在几个世纪的进程中逐渐扩大，进而包括现代语言和文学，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些联合起来，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文化，而不是一个狭隘实用的职业培训"[2]这一语境下精英高等教育等同于博雅教育抑或通识教育，它的存在是为了培养有教养的绅士，而不是某一行业领域内的专家。当以平等为核心的民粹理念逐渐取代了以优秀为取向的精英理念，精英高等教育失去其在知识学习与人格塑造方面的作用，甚至退化为一种职前培训。在难以就"什么是精英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达成共识后，特罗转向从形式上来描述精英高等教育。他认为，"当今的精英高等教育更多地与教学形式、教学实施的场所，以及师生关系而非课程内容有关"[3]他尤为强调精英高等教育的两个显著性特征，首先是亲密而持久的师生关系。特罗认为，"真正的精英高等教育中，师生关系应该是广泛而不是狭窄的，教师关心学生的价值及品格，师生在正式的教学过程之外会经常见面，见面讨论的内容也不局限于教学大纲和讲座"[4]精英高等教育其次的核心特征是激励学生的远大抱负，即暗示学生未来有能力领导重要的社会机构和组织，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特罗发现，精英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经常不成比例的在这个大型社会的领导职位的竞争中获得了成功。"[5]精英高等教育比较大众高等教育而言是

保守和封闭的，它通过代际传递实现“优势再生产优势”。一个精英机构的优秀毕业生，将比其他人享有更加优质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会帮助他们为这门学科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让他们在与领域内领军人物交往或赢得他的赞同中提高自信，这种自信又反作用于个体能力水平的提升。

从少数特权阶层的教育到广博知识的教育，再到师生关系亲密，激励学生远大抱负的教育，马丁·特罗对精英高等教育内涵的界定从学生来源到内容再到形式的变化过程，是精英教育从服务于阶层分化到个人发展再到社会责任的过程，也是精英高等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精英社会化的过程。一方面，精英高等教育从倾向于招收富裕阶层家庭的学生到不再以经济阶层高低来决定受教育对象，他使得每个经济阶层的家庭的孩子，都有了通过努力学习，获得接受精英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无疑是教育机会更加平等的表现。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那些富裕阶层的孩子们会比普通阶层的孩子们拥有更高、更贴近精英高等教育准入门槛的平台。另一方面，精英高等教育从强调广泛文化对心智熏陶的博雅教育，到强调人际互动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作用，进而强调个体的社会抱负，实质是个体从自由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过程。

二、体现国家意志的中国精英高等教育：不同阶段的功能与形态

在论述中国语境下精英高等教育的表现形态之前，重回特罗关于高等教育阶段、机构及形态关系的论述是有益的。首先，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里，均存在精英高等教育形态。其次，在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和大众高等教育机构中，都可能存在精英高等教育形态。而只有这两种形态分工合作，才能既保护精英高等教育的优秀，又实现大众高等教育的平等。

如果以 1949 年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起点，则 1949-2002 年这半个多世纪都是精英高等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的精英高等教育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实际发展状况进一步分为 1949-1966 年、1966-1976 年、1978-2002 年三个时期。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的早期并不存在精英高等教育的概念，高等教育即精英教育。这一时期，承担高等教育职能的大中专院校较少，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各个高校之间也并没有明显的层级划分，各个高校之间享有的资源数额与能向学生提供的教育水平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差异。1949-1966 年，有良好政治素质的才智精英是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获得者，教育目的在于培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者；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民粹主义盛行，出身底层、有高度政治觉悟者获得高等教育入场券，被培养成又红又专的人才；1977-2002 年，高等教育发展秩序恢复正常，才智精英重新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专家是这一时期的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211、985 政策的出台与践行，这一阶段原有的高等教育即精英教育的模式被打破，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和大众教育机构开始出现分类，并以不可互相替代的形式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基于较小的高等教育系统容量以及稳步增长的本科院校数量，拥有较小的校均规模和较低的师生比。这意味着，在同等情况下，一个教师将负责更少的学生，在理想的状态下，每个学生被平均分配到的教师关注度也更高，师生之间能够有更为频繁的互动，能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系。而从教学实施的场所来看，这种精英教育基本上是在封闭的校园环境里运行的。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大学也由学术性社区变成了事业“单位”，它们开始砌起了围墙。日后，大学校园一直保持实行封闭式的寄宿制管理的习惯，并且，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后勤社会化改革之前，教授们基本上住在校园。精英机构过去（并仍倾向于）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清楚、相对封闭的界限，最极端的情况就是通过有形的围墙与社会隔开[6]。有学者认为，围墙是大学自由与开放的壁垒，也屏蔽了大学的气度与胸怀，但姑且不论大学围墙是否应该存在，这一时期的大学围墙的，一方面，隔绝了外界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学生群体与社会群体的联系，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有利于保持精英群体之间高度同质。

2002 年底，我国各类高等学校在学的学生人数为 1600 万，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 15%，进入大众化阶段[7]。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增长，追求效率的管理主义理

念盛行。一方面，不同层次、不同类别高校获得资源差异拉大，另一方面，学校在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上同质化趋向越演越烈，它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特定高水平的大学。

从精英高等教育的实现载体来看，大众化阶段的精英高等教育以国家政策为导向，经历了三阶段的发展变化，首先是上世纪末的“985 工程”“211 工程”的持续推进，高校之间的分层加剧，榜单上的高校获得了中央财政的更大支持和更高的社会认可度，在理想上承担了更多精英教育的责任。随后是“2011 协同创新计划”的实施，这一计划，取消了工程项目延续的终身制体制，以四年为时间节点和评估周期，以国家急需和世界一流为出发点，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作为 211 工程和 985 工程的发展和延续，这一时期的协同创新中心，成为 211 、985 之外，国家用以实现精英高等教育的补充形式。再到 2017 年 9 月，《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的 42 所世界一流大学和 95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它开始意味着，除了始终占据中国大学排行榜前沿位置拥有特殊地位的高校，一些能够发展出一流学科，为学生提供一流教学的高校，也具备了成为精英高等教育载体的可能性。

现阶段，中国语境下的精英高等教育，在以特罗的内涵式特征，即亲密的师生关系以及激励学生的远大抱负作为划分依据之外。随着科学技术取代人文对高等教育的主导，随着商业文化的实用思潮大举入侵校园，今天的精英高等教育最主要的标志已是教学与研究过程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毕业生较强的学术能力，不可否认，相当多的学术精英有朝一日可能成为社会精英，所以，今天精英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以培养学术精英的过程和模式来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8]。不难看出，中国精英高等教育的目的是输出学术精英或社会精英，以精英的发展带动大众的发展，它体现中国欲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国家意志。它让精英大学充斥着浓郁的国家使命，即政府力求在平等基础上的促进优秀。显然，它与大众平等基础上的普遍入学的精英想象，充满了矛盾。一方面，精英大学被局限为以成为世界级名校为目标的一流高校。他们的目的在于力促优秀，培养塔尖式的精英人才，从而为中国输出大量的学术人才，保证学术效果的产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进步。显然，实现优秀的目的，让它只能最大限度的争取平等，而出于现实的考量，国家也只能优先支持部分院校的发展。因为从宏观角度而言，国家难以支撑整体高等教育质量回归到高校扩招前的水准，故而只能从部分进行突破，即“部分再精英化”[9]。另一方面，出于政治经济因素而进行的高等教育扩招，忽视了政治层面和社会系统的对接。社会民众只看到了扩招带来的入学机会上涨和入学人口激增，忽视了高等教育扩招的实施主体，只是一些大众高等教育机构，而不是原来的精英大学。因此，他们也看不到高等教育数量和规模扩张过程中，高等教育的质量被过分稀释的现实。而出于对高等教育的一种延续性期望，他们将大学做了分层式处理，以大学层级和学历为衡量标准，将学历和能力完全对等起来，将大学毕业生视为不同层级的“全面发展的完人”。事实上，我国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阶段的转轨，并未以特罗所言的路径来实现，它既不是传统型精英大学的规模扩张，也并没有将精英大学系统完全转变为大众高等教育系统。而是谨慎保留精英大学原有的招生规模，以大众高等教育机构这股生力军来发展大众高等教育。毕竟，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并无优势。用用精英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来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很可能成为‘压缩型的精英教育’[10]。事实上，大众化教育可以看做是塔形结构，精英教育可以看做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塔之尖顶。它们两者各有特色，并不排斥，各自有不同的功能和任务，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格局[11]。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语境下的精英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府指令色彩，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与马丁特罗对精英高等教育内涵的理解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旨向。后者更强调的是社会福祉和作为整全的人的发展。

三、引导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中国精英高等教育发展的反思

高等教育系统从精英到大众教育阶段或从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向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精英教育类型和大众教育类型一定会消失或转型，在大众系统中，精英高等教育机

构可能不仅得以存活而且更加繁荣；精英职能继续在大众院校中起作用[12]。毫无疑问，在大众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精英高等教育仍然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里占据一席之地，发挥着大众高等教育所不能发挥的作用[13]。潘懋元先生也曾指出，精英和大众是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两个发展方向，而且两个发展方向不完全一致，大众和精英是高等教育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是并存的，不可互相代替的[14]。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大众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精英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阻碍了精英高等教育的发展，如何在持续发展大众高等教育的同时，让精英高等教育在系统内持续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笔者试图从特罗对现阶段精英高等教育内涵的理解反思当下中国精英高等教育的危机与出路。

1.精英高等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为数有限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它有更丰富的存在形态。

“我认为我们在大学校中，在德国大学的高级研讨班上，在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和很多专业学院内，在麻省理工的本科课程学习中，与在哈佛和芝加哥大学的本科学院中，在美国一流的文理学院，以及英国大学的一些本科生的学习中一样，可发现精英高等教育的形态，在这些学院和研究院里，师生关系是广泛的而非狭窄的，教师关心学生的价值及品格，师生在正式教学过程之外也会经常见面，见面时探讨的内容不局限于教学大纲和讲座。这些地方是塑造学生心灵和品质的社会化场所，而不仅仅传递信息、技能和知识”[15]。这是特罗对20世纪70年代精英高等教育广泛的存在形态的理想描述，即精英高等教育在大众高等教育中以非正式、分散但是重要的方式继续着，它在没有提供它生存的系统的间隙中小规模的生存着[16]。我们需要做出努力才能使精英高等教育在大众高等教育机构中存在，即通过为学生提供在学习中与教师建立亲密联系的机会，且通过内在的奖励而非外在的机制来区分有兴趣的学生和没有兴趣的学生，找准大众机构中精英高等教育的受众。特罗用美国一所大众机构提供的精英高等教育形态来例证：一个巨型课堂的权威教师，在课堂上邀请那些想与她一起非正式讨论的学生共进午餐，10到15个学生接受这一邀请，并且持续性地在每周的午餐时间与老师进行非正式讨论，最终，这个非正式的讨论群体，发展成为一个小型的非正式的学科研讨会。学生和教师的亲密互动关系得以存活和发展。

在我国，精英高等教育难以在大众高等教育院校中找到一个具象的存在，因此，要实施这样的精英高等教育，需要由杰出的教师与出类拔萃的学生一起，在宽松的环境中，进行无拘无束的自由探索[17]。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明确：不同类型高等学校职能分野并不意味着高等学校之间的层次分化，事实上，所有高校都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建设成为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但是，如果以教学和研究过程中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毕业生较强的学术能力作为今天精英高等教育的输出标志，很显然，即便大众高等教育机构也研究高深学问，但为研究高深学问准备人才不是这类机构的主要目标[18]。因此，我们不否认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建设成为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的可能性，但是，正如布鲁贝克所言，一个大学如果试图办成满足所有人需要的万能机构，那不是骗人的，就是愚蠢的[19]。不同类型的高校各司其职，才是既保障不同类型高校成为精英高校的现实可能性，又不至于越位与错位的先决条件。对于一流高校，我们需要力促他们在教育系统内的领头羊作用，在推动他们向世界一流大学转变的同时，保护好他们系统内部的精英教学模式，实现优势再生产优势；对于一般高校，基于其现实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水平，设定符合自身能力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发展优秀的学科，而不是简单的复制一流大学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无论处于系统哪一位置的高校，都需要将关注的焦点从资源获取转向学生发展。

2.精英高等教育的内涵应当有更开阔的视野，从世俗的职业发展成就转向强调个体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责任，强调高等教育的“成人”作用。

用“密切的师生关系”和“激励学生远大抱负”两大精英高等教育的核心特征反观我国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的人才培养现状，我们发现，精英高等教育不仅在美国，在中国也是“濒危的物种”。尽管少数精英大学由于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知名校友所带来的“优势再生产优势”效应，比大众高校更具引进优质教师资源可能性，也更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硬件基础

设施。但是，在微观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师生关系仍然是狭窄而不是广泛的，教师关心学生的专业知识的掌握而不是作为完整的人的发展，价值观的培养更多地通过灌输而非陶冶的方式实现，教育目标也更多指向学生个人职业生涯的成功这一世俗意义上的成就。

中国的大学排名对高校、学生及家长、用人单位、社会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中国式大学排名、学科排名的最初意义，只是作为衡量一个大学水平的因素之一，为学生群体和家长群体提供一个择校参考，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排名越来越成为影响其教育教学资源多寡的重要指标，也成为它抢夺优质人才的利器，大学排名越来越形式化，失去了它原始的意义。现今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学校被大学排名绑架，大学绞尽脑汁提高自己的排名，以便在新一轮的招生录取中吸引更多的申请者；学生用狭隘的短期回报率来衡量教育的价值，入校前依据热门领域选择专业，入校后被学分绩点绑架，他们执拗的进入受人追捧的热门专业，不择手段地提高学分绩点，以便在求职阶段，以更强的“竞争力”，收获更高薪安逸的职业和来自社会大众艳羡的目光。学生越来越把高等教育视为通向较好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和社会流动的途径。他们更少地关心高等教育的内在价值。学生们将自身当作教育产品的消费者[21]。大学和学生似乎都不再关注自身内在能力的发展，也不致力于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忽视了，大学的使命，本应该是把青少年转变为成人。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让学生带着问题迎接社会，而不是给学生一份个人简历[22]。他们忘记了，大学的影响力，不在于培养一个职业选手，而在于让你做出对自己而言正确的判断与选择。一份职业可能对他人并不具有吸引力，但是只要你自己觉得有趣就足矣。从事父母所希望的事业并不是问题，前提是，只要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23]。P118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都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24]。这个本身存在“问题”的教育系统，正培养着一批有“问题”的学生。精英大学并不引导学生如何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教育资源去创造更好的社会价值。学校默认了社会的价值取向：物质的成功等同于人品、尊严和幸福。[25] 我国精英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这个问题，不仅应该从日益肤浅化的大学教育模式去探讨，更应该从社会价值观对这种高等教育形式的纵容去深思。

参考文献

[1][2][3]]Martin Trow.Elite Higher Education: An Endangered Species? [M].Minerva 14,no 3(Autumn 1976):147、148、153.

[4][5][6][12][15]马丁·特罗著,徐丹，连进军译,谢作栩校.从精英到大众再到普及高等教育的反思：二战后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形态与阶段[J].大学教育科学,2009(3).8、12、9、16、8.

[7]陈至立.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全面开创教育工作新局面——在 2003 年度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高教研究.2003(1).

[8][18]邹晓平.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两个体系的解读[J].高等教育研究,2005(7).

[9]胡颖珺. 高等教育“再精英”趋势下的弱势群体境况[J].文教资料,2017(13).

[10]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高等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3(6).

[11]鞠楠楠.平等加优秀：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高等教育——读《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 世纪的问题》[J].学园,2014(19).

[13]马丁·特罗著，王香丽译.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外国高等教育料,1999(1).

[14]潘懋元.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应统筹、协调发展[J].教育研究,2004(1).

[16]朱新涛.精英高等教育的传统价值及其现代危机[J].江苏高教,2007(4).

[17]高新发.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精英教育的发展 [J].江苏高教.2002(3):23.

[19]布鲁贝克.高校教育哲学[M].杭州：杭州教育出版社,2001:78.

[20]乐国林,张丽.大学排名对高校影响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布迪厄场域、资本理论的探析[J].现代教育科学,2005(5).

[21]菲利普·阿特巴赫著,蒋凯，陈学飞译.大众高等教育的逻辑[J].高等教育研究,1999(2).7.

[24]吴铭.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缺失的伦理思考[D];南京林业大学;2012.

[22][23][25]威廉·德雷谢维奇著,林杰译.优秀的绵羊[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75、118、65.

The Elegance of Nowhere: The Change and Crisis of China's Elite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ow's Popularization Theory

Pan Shuai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From the education of a few privileged classes to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o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o inspire students' ambitions, Martin Trow's definition of elite higher education is from the source of students to the content and the change of form. The process from serving the hierarchy to personal development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also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of elite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elit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elite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 has a strong government command color, embodying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will, and Martin Trow'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elite higher education show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theory of Trow reveals that elite higher education is not limited to a limited number of eli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t has a richer form of existence; the connotation of elite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have a broader vision, from the secular career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to the emphasis on individuals Responsibility for social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mphasizes the role of “Cultivate” in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Elite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higher education; change; crisis

作者简介:潘帅（1994-），女，湖南汨罗人，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徐丹（1977-），女，湖南汉寿人，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